

Discourses on Audience

閱聽人論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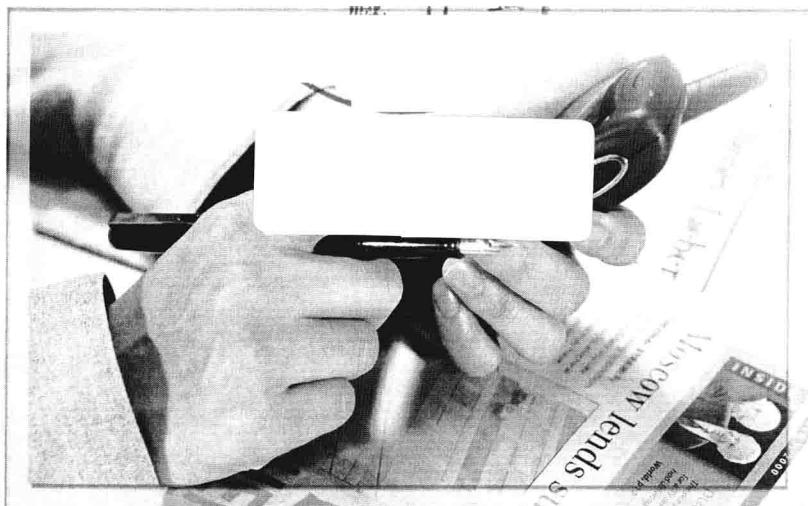
◎盧嵐蘭 著



Discourses on Audiences

閱聽人論述

◎盧嵐蘭 著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

閱聽人論述 / 盧嵐蘭著. -- 一版. -- 臺北市
：秀威資訊科技, 2008.04
面； 公分. -- (社會科學類 ; AF0079)
參考書目：面
ISBN 978-986-221-002-4(平裝)

1. 閱聽人 2. 閱聽人研究

541.83

97006605



社會科學類 AF0079

閱聽人論述

作 者 / 盧嵐蘭

發 行 人 / 宋政坤

執行編輯 / 詹靚秋

圖文排版 / 郭雅雯

封面設計 / 蔣緒慧

數位轉譯 / 徐真玉 沈裕閔

圖書銷售 / 林怡君

法律顧問 / 毛國樑 律師

出版印製 / 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內湖區瑞光路 583 巷 25 號 1 樓

電話 : 02-2657-9211 傳真 : 02-2657-9106

E-mail : service@showwe.com.tw

經 銷 商 / 紅螞蟻圖書有限公司

台北市內湖區舊宗路二段 121 巷 28、32 號 4 樓

電話 : 02-2795-3656 傳真 : 02-2795-4100

<http://www.e-redant.com>

2008 年 4 月 BOD 一版

定價 : 210 元

• 請尊重著作權 •

Copyright©2008 by Showwe Information Co.,Ltd.

序

我們都是閱聽人，然而我們又常對閱聽人感到好奇與不解。閱聽人在當代社會中具有高度重要性，不只媒體重視閱聽人，舉凡政治、商業、學術、社運界等也都關注閱聽人，因為閱聽人已成為一種資源與力量。大家都想知道如何吸引閱聽人，或是如何影響閱聽人，許多關於閱聽人的探討皆屬於直接或間接服務於這些目的。

閱聽人分散四處，閱聽人使用媒介的過程或解讀媒介文本的情形都不是十分明確清楚，因而人們一面探討閱聽人也一面想像閱聽人，所以我們有了許多關於閱聽人的說法，它們企圖讓大家了解或相信閱聽人是什麼樣的人、會做怎樣的事。然而這些說法如何形成、它們如何描繪閱聽人，這些也是值得觀察的課題，本書嘗試進行這項工作。

了解閱聽人其實頗為困難，包括我們自己雖然做為閱聽人，假如未能靜心自省，也往往不易透澈了解自己的媒介經驗。由於媒介滲透至日常生活的許多層面，並和許多日常活動結合，所以要了解閱聽人便必須去認識閱聽人的生活，因為人們是在許多日常活動中接觸及使用媒介而成為閱聽人，人們對媒介的經驗總是夾雜著其他活動的經驗，也牽涉著一些社會關係的影響，所以閱聽人的經驗總是比表面行為來得複雜得多。儘管這些繁複及晦澀的過程令人感到困擾，但卻是探討閱聽人時必須觸及的經驗層

次，所以晚近的閱聽人研究已更加注重日常生活脈絡的影響，以及閱聽人的各種反應形式，力圖讓閱聽人的真實經驗更鮮活地呈現。

本書探討閱聽人研究中對閱聽人的處理方式，以及其中對閱聽人的概念建構，並試圖說明閱聽人經驗歷程的意義，希望能在概念思考層面上有助於閱聽人研究對閱聽人的說明及詮釋。筆者思慮或有不周，尚祈各界先進不吝指正。

盧嵐蘭

寫於 2008 年春

目次

序	i
第一章 緒論	1
第一節 閱聽人概念及想像的閱聽人	2
第二節 閱聽人研究與閱聽人概念	7
第三節 本書範圍——閱聽人研究論述的反思	12
第二章 閱聽人論述的多樣性.....	15
第一節 多樣的閱聽人模式	15
一、形式的閱聽人.....	17
二、經驗的閱聽人.....	18
第二節 閱聽人的本質化與非本質化	23
第三節 閱聽人的變化及概念論述	31
第三章 閱聽人研究的論述位置.....	35
第一節 閱聽人科學論述中的論述位置	35
一、科學社群與論述位置	35
二、閱聽人概念的科學論述位置	39
第二節 閱聽人研究中的倫理論述以及 道德與政治選擇	43
一、學術論述及論述習慣	43
二、科學論述位置與倫理論述位置	46

第三節 論述位置與權力關係	52
一、閱聽經驗之學術性建構	52
二、閱聽人論述的社會意義	59
第四章 歷程及變化——閱聽人經驗的說明架構	63
第一節 閱聽人研究及歷程觀點	63
一、閱聽人的經驗「歷程」	63
二、閱聽人的參與和歷程觀念	65
第二節 懷德海的範疇總綱	69
一、終極範疇	69
二、存在範疇	71
三、說明範疇	73
四、義務範疇	76
第三節 閱聽人經驗的範疇建構	79
一、終極範疇與閱聽人經驗	80
二、存在範疇與閱聽人經驗	81
三、說明範疇與閱聽人經驗	88
四、義務範疇與閱聽人經驗	91
第五章 閱聽人研究的概念論述	99
第一節 閱聽人：概念論述的相關問題	99
一、多重轉譯、脈絡、視域	99
二、個人／群體、部分／整體、想像／相信	101
三、概念與範疇	103

第二節 閱聽人經驗的關係性	107
一、範疇及認識架構	107
二、關係內的構成元素	110
三、關係的建立與發展	112
第三節 閱聽人經驗的歷程性及其基礎	116
一、經驗的歷程性	116
二、歷程經驗的基礎	120
第六章 閱聽人研究的歷程取徑與閱聽人潛能	125
第一節 閱聽人即行動者	126
第二節 閱聽人的歷程性與世界性	132
一、世界性與行動者	133
二、閱聽人與世界公民	135
第三節 歷程經驗與閱聽人主體	141
一、從現代主義主體走向超越之路	142
二、閱聽人、主體、歷程性	148
第七章 結論	155
第一節 當代閱聽人	155
第二節 回歸閱聽人經驗	158
參考資料	161

第一章 緒論

顧名思義，閱聽人研究是一個針對閱聽人及其相關現象的學術領域，所以這個領域中的主角「閱聽人」應該具有最鮮明的形象；然而弔詭的是，不少時候，學術研究中的閱聽人卻相當模糊與不明確，這並非說閱聽人研究者不知道自己的研究對象，而是指「閱聽人」經常以一種「再現」形式而進入閱聽人研究中，它們總是由於不同的再現方式而呈現各種差異。有時候，這些差異反映閱聽人的實際情形，更有些時候，它們還進一步反映再現過程所涉及的相關運作條件。可以說「閱聽人」是一種「建構」產物，屬於一種概念建構，然而我們經常據此而認識「閱聽人」，或依此而進一步去說明及判斷我們的媒介社會。因此，這裡出現一個必須處理的課題，這些被再現的「閱聽人」係經由何種建構過程而被產製，又讓我們如何認識閱聽人的各種風貌。固然，社會中有許多不同領域或機構都參與了再現閱聽人的過程，諸如政治、企業、傳媒、學界、乃至閱聽人自己都各自以某些角度及方式去捕捉或描繪閱聽人的輪廓，而其中透過學術性或科學性的探索及說明，往往在社會中成為具有重要意義及影響力的論述，因此，如果想要認識「閱聽人」如何被建構及再現，則了解學術圈如何處理「閱聽人」此一概念，便成為一種值得嘗試的管道，人們或許可由此而多方面去思考及觀察我們的傳播社會。

第一節 閱聽人概念及想像的閱聽人

閱聽人研究經常藉由預設的閱聽人概念而進行相關研究，即使不少研究對閱聽行為及其社會文化層面進行相當豐富的描述，不過做為基本的閱聽人概念本身卻較少成為注意焦點，似未能充分了解閱聽人概念的實質意義與可能影響。由於閱聽人研究的相關理論與研究傳統多側重於閱聽人形成的歷史發展、影響因素、研究流派與走向、以及種類衍變等，但對這些現象背後的概念成因與影響，卻不常提出充分的討論，然而對基本概念的反省及檢討往往關係著特定研究領域的深化、重整、與再出發。

如果我們暫時從一個略為簡化的角度來看，閱聽人研究在過去數十年中歷經的典範變遷，已代表「閱聽人」已在我們的觀念及想像中出現變化。從近來閱聽人研究出現的新概念與新觀點來看，其意味過去常使用之受眾觀念所具有的大眾意涵已不全然適用，閱聽人研究領域的多樣發展，使得舉凡認知、態度、投入情形、解讀型態、性別、階級、族群、家庭脈絡、消費品味、文化框架、新科技、在地／全球等因素都成為必要的考慮因素，因而促使研究者意識到必須在理論與方法上有所調整（Livingstone, 1994; Morley, 1994）。

在對閱聽人的不同觀察角度中，不管是將閱聽人研究分成若干取徑，例如簡森（Klaus Bruhn Jensen）與羅森袞（Karl Erik Rosengren）（1990）將閱聽人研究分類為五種傳統，或麥奎爾

(Denis McQuail) (1997) 將之區分成三種研究取徑，抑或是艾伯克隆比 (Nicholas Abercrombie) 與朗赫斯特 (Brian Longhurst) (1998) 提出的三種典範，在這些論述中，研究者還是預設某些閱聽人概念的基本假定，或將這些基本假定存而不論，因此「閱聽人」成為一種「自然的」概念。「閱聽人」可算是傳播研究的基本概念或辭彙之一，在行之有年的閱聽人研究或測量中，不管是量化或質性研究，無不試圖建構某種閱聽人的真實 (Miller, 1994; Moores, 1993; Ang, 1991; Ang, 1996)，這些發展與變遷或許可簡單地描述為，研究者對閱聽人的認識已從過去視閱聽人為孤立的、被動的、與易受傷害，轉而強調閱聽人做為各種社會成員的身分，並進而與媒介文本產生互動的詮釋關係，同時也更加重視及探索不同社會脈絡的影響 (O`Sullivan, 1994: 19-20)。不過大多時候，這些研究仍未能明確勾勒出所謂閱聽人究竟為何，譬如，在這些建構的閱聽人真實中，有些屬於實徵性真實，另一些屬於概念性真實，還有屬於心理／精神真實。基本上，這些被建構之閱聽人真實所反映的存在處境與經驗形式，是使這些閱聽人概念獲致有意義之詮釋的基礎之一。有些人從媒介社會中的自我與經驗著手，探討媒介社會對建構自我的影響 (e.g., Thompson, 1995)，或者指出後現代媒介化的經驗特質 (e.g., Taylor & Saarinen, 1994)，這些論述的共同點便是認為，面對媒介社會之變遷與後現代的挑戰，人們對閱聽人的概念想像可能須有別於現代主義的典範，尤其是認為閱聽人出現新的經驗形式，因此研究者也須採取異於傳統的探討方法。

然而這些探討方式或觀照角度，依然屬於對閱聽主體的另一種詮釋與建構，不管是現代主義的或後現代主義的取徑，都仍然

行走於建構閱聽人真實的道路上，「閱聽人」還是一個通過某些想像方式而呈現的概念。概念形成及其意義皆和論述脈絡關係密切，每一種研究取徑所論述的閱聽人真實總會反映該論述的產製過程，以及產製者所處的位置及條件。閱聽人概念因為這些不同的論述背景及過程，而在概念內涵中出現不同的偏倚。例如，時代的變遷往往凸顯於思考方式的改變，過去閱聽人研究多以個人的媒介使用行為為主軸而了解閱聽人，然而隨著社會的改變，以文化主體的角度來探討閱聽人的經驗被認為應是一種應努力的方向（Davis & Jasinski, 1994），於是許多社會範疇如階級、族群、性別、次文化等都成為探討閱聽人時的觀察方向，因此發展成各種閱聽人概念，也包含著對閱聽人主體的假定。

一般而言，主體論述是一個具爭議性的領域，尤其在後現代處境中，主體常呈現許多不同變貌，其中一種說法便是以遊牧式的主體來描繪新的經驗形式，這種不同於現代主義論述的主體性呈現出人們面臨一個自省的年代與社會符碼的重整，人們不斷走向自我，也因而愈來愈從屬於自己（Deleuze & Guattari, 1984; Elliott, 1996）。然而主體也可能因為社會關係的表面化和移動化，而出現無所依歸的經驗特質，因此後現代的主體兼具遊歷者、流浪者、旅行者、及遊戲者等特性，它們都異於現代人具有的一種宛如朝聖者之性質（Bauman, 1993, 1996; Probyn, 1996）。但是後現代主體未必因此而不相容於現代主義的主體，也或許前者原本就存在於現代社會中，只不過以前位處邊緣，如今則成為經常體驗到的生活形式（Bauman, 1993, 1996; Boyne & Lash, 1990）。雖然這些敘述各異其趣，但從某個角度來看，其實這些主體論述反映的是建構自我時所涉及之知識、實踐、與技術的歷史變遷（Rose,

1996），主體建構是一種管理自我的方式，在不同的環境下，個體的某些層面會被視為必須關懷與探討的對象，當然，其中還牽涉哪些人基於何種正當性，設定何種目標，並運用何種方法來探究這些對象。這些情形也都出現於閱聽人主體的討論中。

主體論述涉及理性問題，誠如許多後現代理論對理性的質疑，如果主體係藉由理性來掌握事物，則真正的情形是，理性透過再現而認識世界，但由於再現不可能等同於世界，所以理性也絕無法完全掌握事物，此際唯有透過想像才能支撐理性與事物的關係，並且還不能過度揭發此種關係所具有的虛構性，理性才得以建構現實（Dolar, 1994），所以理性與意識的消解遂成為認識過程的必經之路。不過反主體或反主體性的論述，往往面臨行動與判斷上的困難，因此是否必要重新思考這些問題以建構有意義的主體經驗一直是個被注意的論點（Lash, 1990; Jagger, 1996）。這些討論的關鍵之一在於，論述主體本身即為脈絡的產物，因此與其說它們是在呈現主體的狀態，不如說是呈現主體論述的狀態，這會引領我們走向概念探討的層面，因為如果概念提供的解釋可經由概念引導論述之方式而顯示，則我們探討概念的意義就不只是概念被賦予的意義，還包括概念使用的意義（Rosen, 1982: 1-22），因此主體的討論必須同時涵蓋主體概念的討論，並探討概念被用來組織人們觀察事物的方式。

在探討概念時，如果從語言分析的角度來看，則不管視概念為客體的綱目，或一種未飽和狀態、或是擁有語言能力，皆有可能會面臨解釋上的不足。現象學把擁有概念界定為獲得某種經驗的能力，或指涉某種經驗的能力，這種方式或可補語言分析上的不足，因為概念意義必須指涉某種可能的意識形式才得以被了解

(Pivecic, 1975)。也由於概念須以經驗為基礎，所以概念範疇的建構也必須因應這種觀察，範疇不再是傳統認定之組成成分共有的必要與充分條件，它們並非直接對應於經驗以外的客觀現實，範疇的形成係基於想像的結構性認知模式，這些想像有賴於知覺能力與行動能力，但其結果又具有經驗上的主導性 (Johnson, 1987)，換言之，範疇建構不只是客觀認識的領域，也同時屬於行動層面的基礎。現象學者葛維區 (Aron Gurwitsch) (1974) 同意胡賽爾 (Edmund Husserl) 的看法，認為所有的邏輯範疇皆衍生自知覺經驗的基本結構，因而所謂的主體與述詞不能只被視為邏輯範疇，而是表現出某些知覺結構。由於範疇隱含有經驗與行動的基礎，因此認識的問題必然和實踐問題關係密切，範疇建構遂可延伸為行動能力的建構 (Frye, 1996)，從這個角度來看，範疇建構問題也就可以成為一種能力及權力之問題。

換言之，概念論述及範疇建構不只是科學研究的產物，它們既作為一種科學知識，同時也是一種社會控制系統，這種觀點對討論閱聽人概念及閱聽主體時具有參考價值，因為知識是一種文化形式，它們不僅構成意義，還會創造人們的認識對象與社會實踐，事實上，人類的經驗就是透過人們的概念化方式及其內容所構成 (McCarthy, 1996)。假如說知識已成為一種有力的文化勢力，且社會真實不過是知識過程的結果，則閱聽人概念在許多相關論述內的角色，以及它本身透過某些論述而被建構的過程，就相當值得進一步了解，因為知識並非只是抽象的與靜態的思想產物，知識的形成過程在實際的感覺體驗以及抽象的思想形式之間來回穿梭，二者是兩種知識形式，人們的經驗現象便是發生於兩種知識形式的接觸過程中 (Game & Metcalfe, 1996)。如果借用

這種看法，則閱聽人概念與範疇等相關論述也同樣可能指涉兩種知識形式之間的互動，在此互動過程中逐步發展出各種閱聽施為者（agent）與閱聽主體的概念建構，施為者與主體概念皆涉及個體蘊蓄及展現的能力和可能性，它們屬於某種能量或權力。就施為者本身的權力或自然能量而言，其呈現為一個連續帶，施為者的主動行為必然涉及此連續帶的某些層面（Gustafson, 1986），而我們可以援引此觀點去探討閱聽人概念及閱聽主體論述是否及如何觸及此連續帶中的哪些能量。

第二節 閱聽人研究與閱聽人概念

常見的幾種閱聽人研究取徑，不外乎從心理因素、情境因素、社會文化因素、媒介因素等來思考，此猶如以這些因素作為參考架構，進而蒐集相關的實徵資料來從事說明，這就像是在一些意義類型上填補具體的與實際的經驗，以做為問題的一種解答或了解。當然人們可能討論這些意義類型是否充分而完備，此外，閱聽人既然是異質而多樣的，人們就總能發現並提出許多具有某些屬性的閱聽人概念。不過除此之外，還有一些後設層面也值得研究，例如，是哪些因素在引導觀察、這些因素如何引導觀察、前兩項問題造成怎樣的認識結果、這些認識結果又如何建構社會真實、以及這種社會真實之建構隱含何種實踐層面上的意義。雖然探討這些問題並不保證對閱聽人研究與閱聽人現象的全面掌握，但卻有助於促進對這個研究領域的了解，因為它們不只是問閱聽

人是什麼以及在做什麼，而更要問「閱聽人」概念是什麼以及被拿來做什麼的問題，也同時可呈現出概念在管理與指導論述上扮演的角色。

傳播社會學者湯普生（John B. Thompson）（1994: 27-49）在探討媒介社會時指出，象徵權力便是使用象徵形式去干預及影響行動或事件過程的能力，而象徵形式指的是傳遞資訊或符號內容的各種表達形式，個體行使象徵權力時會使用各種資源，與其他權力形式相同的是，行使象徵權力所使用的資源，可被累積於機構與制度中，並獲得某種程度的自主性與穩定性。這些說明固然是針對傳播社會的發展與影響，然而對閱聽人論述本身涉及的象徵層面而言，亦相當適用。閱聽人概念及論述代表著聚焦及凸顯閱聽人某些面向的象徵形式，它們可能強化人們對閱聽人的特定印象、認識、及信念，並據此而接續引導出對媒介、政府、教育、及家庭等方面的相關管理要求。這些討論的背後可溯及「閱聽人」概念如何在某些脈絡下被想像與建構，探討閱聽人概念的論述脈絡旨在了解一個基本概念在其發展過程中，可能獲得怎樣的資源，以及展現何種權力形式，這項工作也就是去探討人們視為理所當然的「閱聽人」概念所憑藉的論述資源及其發展出來的結果。

換言之，這項工作旨在了解研究者在論述過程中運用概念的基礎。許多閱聽人論述反映出閱聽人概念的多樣性，此意味著研究者面對的研究對象並無固定明確的範圍或輪廓，所以研究者的論述往往是基於特定的立場而建構所謂的「閱聽人」。在這種情形下，閱聽人概念在反映研究者的觀察角度之餘，總可能遺漏其他面向（Brunt, 1992）。布迪厄（Pierre Bourdieu）以為學者傾向出現特殊的學究觀點，當這些觀點未經反省就被應用時，有可能

破壞它的認識對象，並創造一種純粹的人造物，同時也可能將這些學究觀點植入研究對象心中，或將自己的探討方式及知識模式歸之於認識對象(Bourdieu, 1998: 129-130)。同樣地，費斯克(John Fiske) (1992)也引用布迪厄的「習癖」(或生活心態)(habitus)概念而指出，學者習以為常的思維習慣與特性，使他們傾向進行抽象思考與概化推論，因而較未能充分掌握具體及實際的情形，學者的習慣性思維可能難以想像或捕捉日常生活具有的具體性、脈絡性、與鮮明性。這些學者都強調科學論述的限制，並指出應注意學術活動與客觀真實之間的距離，以此凸顯學術討論及其社會意義之間的關係。

拉圖爾(Bruno Latour) (1988)認為科學說明所展現的力量不僅是屬於邏輯方面的，也同時具有政治含意，他甚至懷疑理論說明力是否為一個值得追求的研究目標，因此轉而期望在科學語言之外致力於達成研究論述與研究對象之間較平等的地位。換言之，他質疑科學論述的傳統優勢，並認為研究者的語言有必要放棄傳統科學式的強勢說明，在此過程中，研究者方能進一步走入研究對象所屬的領域。這點和夏特(John Shotter) (1993a, 1993b)的看法類似，夏特將知識分成三種：實際知識、理論知識、和參與知識，其中的參與知識即指透過參與而從認識對象的內部獲得理解¹，強調認識者與被認識者的對話互動是獲得參與知識的主要方式，也就是科學論述必須從日常生活論述中汲取資源。

¹ Shotter (1992) 強調的「參與知識」旨在說明後現代研究在獲得知識之形式上已有所轉變，也就是從過去透過觀察而獲得知識轉變成透過接觸而獲得知識，這種轉變還包含幾項重點：人們從過去的重視理論轉而重視實踐；由重視事物的本身轉而重視活動與使用；從注意個體腦中想法轉而注意環境與社會的性質，以及後二者所能提供或允許的可能性；由專注於個體自己的行為